

從陳獨秀到顧準和李慎之

◎ 袁偉時

一 激進與自由的雙面人——陳獨秀

李慎之先生（1923–2003）仙逝，一個嚴肅的問題需要人們作出認真回答：李先生從二十世紀90年代起成為中國自由思想的代表意味著甚麼？愚意以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對二十世紀世界和中國思想發展的全局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簡單地說，自由、民主、法治思想與極權主義的生死搏鬥，是牽動二十世紀人類思潮和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後者利用了現存制度的社會不平等和國家不平等。於是，以消滅社會不平等為旗幟，寫下了蘇聯七十四年的血腥歷史。以消滅國家不平等為職志的東方各國民族解放運動，則在許多國家程度不等地加上兩種作料：所謂「畢其功於一役」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以民族特點為藉口營造專制體系。

中國의思想和歷史發展是這個大格局下的一個重要拳擊場。搏鬥雙方的分歧不在要不要一個獨立的中國——消滅國家不平等，而在要一個甚麼樣的中國：是現代主流文化指引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國，還是另闢捷徑，「畢其功於一役」的中國？簡單地說，依然是現代主流文化與極端思潮之間的搏鬥。其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是陳獨秀。

陳獨秀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是由三件事決定的：

1、他繼承嚴復、梁啟超等第一代啟蒙思想家的未竟事業，發動了以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新文化運動，為現代世界主流文化在中國生根清掃路障建立了永恆的功勳。

2、進入20年代後，他成了激進的極端思潮的代表。

從領導創建共產黨到成了極端主義小組——中國托派的領袖，其所作所為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嘗試把除社會民主主義之外的馬克思主義三大流派中的兩個（列寧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應用到中國。而這兩大流派的共同特點，是誇大現代社會政治、經濟運行的基本架構的缺陷，把發展過程中的參與面不足和分配不盡合理，說成是它們應予徹底摧毀的理由；從而抹煞了社會管理的歷史經驗。用陳獨秀的話來說是：「甚麼民主政治，甚麼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是「欺騙勞動者的」¹。「法律是強權的護符，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²於是，他所嚮往和鼓吹的「革命」，不是維護和加強民主、法治，擴大人類自由，而是告別主流文化，建立嶄新的「人間天堂」。

3、從抗日戰爭爆發後，逐步告別激進主義，向現代主流文化回歸。

隨著政治實踐的進展，特別是蘇聯政權殘暴本質的暴露，他逐步認識到，托派「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小集團……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³，「所謂『無產階級專裁』根本沒有這個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度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因此，他斷言：「『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⁴二十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國許多著名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和大批熱血青年把蘇聯看作理想世界的化身和中國的明天，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可謂石破天驚的棒喝！

從1903年5月組織安徽愛國會算起，至1942年5月離開人間，陳獨秀三十九年的輝煌歲月，是分別以激進和自由為標誌的雙面人。這兩面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潮變遷的側影。他在自己生命最後幾年回歸現代主流文化的大徹大悟，則開啟了三十年後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覺醒的端倪。作為這個覺醒過程先後飄揚的兩面旗幟，還有顧準和李慎之。

二 顧準、李慎之倡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從思想上看，顧準和李慎之是同齡人。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個三十四歲，一個二十六歲，都是年輕的老共產黨員。1956、57年間，他們同在北京並不相識，卻分別提出兩個事關歷史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顧準的基本思想是：「從全部國民經濟生活上說，不讓價值規律既調節流通，又調節生產，結果必將割裂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聯繫，因而將發生有害的結果。」他認為應該「使勞動者的物質報酬與企業贏虧發生程度極為緊密的聯繫，使價格成為調節生產的主要工具」。一定不能忘記「價值規律在客觀上是制約著經濟計劃的」⁵。透過當時歷史條件下必然帶有的烙印和語言，實質是要求把市場作為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基本機制，推動我國經濟向現代經濟靠攏。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說：當時在中國，「只有顧準鮮明地提出讓價格的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所以，顧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⁶

這時李慎之提出的是政治制度問題。李先生回憶當年情景時寫道⁷：

當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亂而派秘書林克到新華社來向王飛和我徵求意見的時候，我們就大談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冷西同志（當時任新華社社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吳冷西）向我說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我就向林克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冷西還向我說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說「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小學中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者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冷西又告訴我「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我就說「我們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院」。

同一時候，顧準也在思考「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問題。稍後他清晰地說明：「第一個問題是政治—哲學問題。」「最不重要的問題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個

必須正視的政治問題是恐怖主義。「羅伯斯比爾式的恐怖主義是夭折的，社會主義的羅伯斯比爾主義並沒有夭折。法國大革命造成了一個拿破崙，社會主義造成了斯大林與毛澤東。」⁸到了70年代，他終於徹底清算了導致暴政的「直接民主」，毫不含糊地指出：「奢望甚麼人民當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入借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的擁護者之列。」「兩黨制的議會政治的真正意義，是兩個都可以執政的政治集團，依靠各自的政綱，在群眾中間競爭取得選票……這是唯一行得通的辦法。」⁹

無論顧準還是李慎之，在1950年代都還是真誠的共產黨員，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殘暴統治的真相，是他們思想發展的轉折點。他們在驚醒後渴望與自己血肉相連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接納他們善意的建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他們冷靜地考慮中國的現實，終其一生都沒有組建反對勢力圖謀推翻中國共產黨。他們是作為傑出的思想家在現代中國歷史上佔有崇高地位的。

顧準作為殉難者早已寂寞地離開人間。儘管有些權勢者仍然視之為異端，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卻深知：他的文章是他用血淚寫下的中國人苦難根源追尋錄；咀嚼他的思想遺產，就是繼承歷史智慧，銘記刻骨錐心的教訓。

現在，積極倡導中國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李慎之也離開我們了。中國人更不應忘記，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瘋狂，歸根到底是由於政治上的獨裁專制。可悲的是這個關乎中國國運的關鍵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決，乃至李慎之不得不在1999年重新提醒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風雨蒼黃五十年〉）

三 尋求民主與專制的歷史淵源

顧準和李慎之這對雙子星座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並不是偶然的。除了客觀環境外，他們自身的思想路徑也有許多足以啟迪後來者的特點。

他們都在古今中西上下幾千年的歷史中反覆比較求索，從中西歷史差異中尋求民主與專制的歷史淵源。一致肯定專制是東方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自由、民主、法治則是西方社會各種歷史因緣際會的產物。顧準認為自治城市、法治、民主、個人權利這一套「只能產生於航海、商業、殖民的民族中」，「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國歷史上所絕對不會發生的，甚至是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沙皇統治下所不允許存在的。」¹⁰李慎之先生則痛斥倡導中國傳統文化和所謂亞洲價值可以「為萬世開太平」等虛驕之氣，就是察覺如此「對全人類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場經濟、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調，因而有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危險」¹¹。所謂中國可以從內部自然產生出資本主義，有些人津津樂道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其實是片面看待一些經濟現象，而忽視了資本主義是經濟、政治、法權和文化等因素的綜合體系，沒有經濟自由和法治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現代化。

李先生有機會觀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新的環境推動著他思考一些新的重大問題。

第一是對全球化的分析和對阻礙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的種種藉口的批判，特別是對所謂亞洲價值的批判。

李先生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並有深厚的學養。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先生，是在90年代初中國文化

書院在泉州舉行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會上，晚上去拜會他，他直截了當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一套很多人不信了」，應該重新探討哲學問題。他於92、93年間寫就的〈辨同異合東西〉和〈中國哲學的精神〉，體現著他在這一領域的探索成果。他在1995年9月13日一封給我的來信中寫道：「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天然地認為中國哲學最符合未來的全球價值，比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

李先生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田園牧歌，必然伴隨著血與火及其他污穢，但這是無法抗拒和有利人類長遠發展的歷史潮流。他深知根本沒有甚麼統一的亞洲價值，中國必須吸收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拒絕東方主義一類叫囂。

與他發表〈全球化與中國文化〉、〈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等宏文的同時，1995年5月31日在給我的手教中，他語重心長地指出：

在目前的中國，最需要的是要有真正懂得中國的弱點與缺點而又真正向外國學習的人，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老老實實，學他幾十年，中國是會有希望的，僅僅是自以為是地逞英雄充好漢，只能給我們苦難深重的民族再添苦難。

這些話絕非無的放矢。他寫道：

現在學術界刮起一股東方主義，反後殖民主義之風。其維護中國文化之志可敬可佩，但是奇怪的是：一，這些愛國志士對中國文化的知識之貧乏，令人吃驚。像我這樣七十幾歲的老人完全可以認為他們還比不上六十年前的中學生。二，他們用的「話語」完全是西方「後現代化」的話語，為我這樣的人難以了解。這樣他們在思想以至語言上都已首先「自我殖民地化」了，卻還要義憤填膺地反殖民化，這是當今學術界最為奇妙的景觀之一。

與此同時，李先生嚴肅指出：「東亞文化（姑且以中國的儒教文化為代表）、南亞文化（姑且以印度的印度教文化為代表）、西亞—中亞—北非文化（姑且以阿拉伯的伊斯蘭文化為代表）。三者大不相同，其差別實不亞於中國與西方的差別。」¹²侈談亞洲價值不啻自欺欺人。

第二，他適時地在中國大地公開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在中國特殊環境下，衝破禁錮需要極大的勇氣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李先生適應歷史潮流，把80年代以來已經廣泛傳播的自由主義從思想潛流變為公開合法的公眾話語，把這面大旗舉了起來。

他說：「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義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價值。」企盼「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在他看來¹³：

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可以是一種社會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因此，近年來他一再大聲疾呼，要認真研究顧準，要重新啟蒙，要進行公民教育。

第三，揭露歷史真相，清算專制主義。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指出：「政治

輿論一向、並將永遠與人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緊密相關。」¹⁴因此，揭露歷史真相，粉碎專制統治者及其爪牙刻意製造的歷史神話，成了中國回歸現代主流文化的重要一環。如果說顧準是在中西歷史的對比中清算中國專制主義的老根，那麼，80年代以後，人們則直接從對反右、大躍進、文革三大災難的控訴開始，揭露專制統治的罪惡，為回歸主流文化奠定思想基礎。在這一影響深遠的揭穿謊言、披露真相的刨根活動中，李慎之先生的〈一段公案的由來〉和〈毛主席是甚麼時候引蛇出洞的？〉，以其翔實的史料和入木三分的分析有其特殊意義。

四 顧李兩人的同和異

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甚麼恰好是顧準和李慎之先後在共產黨內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竊以為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一是兩人都生性耿直。須知他們都是由於多次對權勢說不，而鑄造了自己的苦難和輝煌。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因素：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內受過自由、民主洗禮的知識份子黨員，並且有機會繼續接觸外來先進思想。他們年輕時是滿腔熱血、志在救國救民的理想主義者，因不滿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專制和對外軟弱而參加共產黨。經過重重挫折後發現自己參與締造的竟然也是一個專制體系，理想破滅後的苦痛催促他們奮起。不過，光是受苦還不足於造就一個思想家，還要有新鮮的思想養料，而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的李慎之恰恰站在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上。顧準1955、56年間在中央黨校學習和其後的歲月裡，在接受思想灌輸的同時，居然從縫隙中找到了外來先進思想的養料。

1975年顧準是在淒風苦雨中孤獨地告別人世的，連兒女都不願或不敢見他最後一面；其主要著作在他逝世二十年後才在中國知識階層中廣泛傳播。這體現了在文革時期「全面專政」的恐怖氣氛和思想鉗制下，知識階層在奴役狀態下的奴隸心態。1970年代末開始的思想解放，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基本口號的，在此之前的張志新等人也是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奮起反抗的。當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屈指可數，顧準是冰雪世界中屹立的孤峰。

畢竟二十八年過去了，時移勢遷，李慎之和顧準的處境已有很大不同。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解放是以文革和六四兩大歷史事件為契機的。他們分別成了兩個階段的重要標記。

六四後中國的思潮已經起了巨大變化。一大批出生入死的老革命的思想，不願再受僵死的教條束縛；李先生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知識結構嶄新的知識階層已經崛起。李先生晚年揮筆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立即傳遍海內外，千百萬中國人默默反覆吟誦。從李先生病危一直到逝世以後，許多人用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悲痛和敬意。李慎之是層巒疊翠中的高山，是號召人們不屈不撓追尋真正的現代化的號角和旗幟。高山仰止！安息吧，李先生！再過二十年，當您百年冥壽到來時，回望神州，必然看到滿眼都是挺直了腰杆的現代自由公民！

* 經作者同意，此為本刊編輯室的壓縮稿，原文八千字。

註釋

- 1 陳獨秀：〈《共產黨》月刊短言〉，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50。

- 2 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精神是甚麼？〉，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上），頁518。
- 3 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載張永通、劉傳學編：《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頁183。
- 4 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載《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頁204-205。
- 5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載《顧準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頁50、33、45。
- 6 邢小群：〈我與顧準的交往——吳敬璉訪談錄〉，載陳敏之、丁東編：《顧準日記》（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頁430。
- 7 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來〉，載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頁339。
- 8 陳敏之、顧南九編：《顧準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100-102。
- 9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載《顧準文集》，頁368、364。
- 10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載《顧準文集》，頁314、316。
- 11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載《中國的道路》，頁39。
- 12 李慎之：〈關於文化問題的一些思考〉，載《中國的道路》，頁78。
- 13 李慎之：〈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載《中國的道路》，頁245。
- 14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編，秋風譯：《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1。

袁偉時 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3年6月號總第七十七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